

副文本在文学外译中的文化调节研究*

胡业爽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200083;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 400031)

提 要: 副文本的文化调节是指相关主体通过副文本书写来拉近译语读者与原作间的文化距离,使读者不断接近源语文化现实的做法。与译文内的文化调节相比,副文本的文化调节作用一直是被相对忽视的。然而,译文内的文化调节要以读者阅读正文本为前提,且译文内的文化调节囿于正文本的方寸之地,调节效果十分有限。为了保证原作域外接受和文化传播的效果,副文本的文化调节十分必要。基于此,拟研究副文本文化调节的特点、过程、目标和方式,以期深入认识副文本的文化调节作用,更好服务于我国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

关键词: 文化距离; 副文本; 文化调节; 文学外译; 文化翻译; 译者

中图分类号: H3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20)03 - 0081 - 7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 - 1071/h.2020.03.013

On Cultural Conditioning of Paratext in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ion

Hu Ye-shuang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The cultural conditioning of paratext refers to the practice that the relevant subjects narrate the cultural distance between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 and the original work through the paratext's writing, so that the reader can get closer to the reality of the source language culture. Compared with cultural conditioning in the narrowly defined translation process, the cultural conditioning of paratext has been relatively neglected. However, the cultural conditioning in transl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emise that readers read the text, and the cultural conditioning in translation is confined to the space of the text, so the effect is very limite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ffect of overseas reception and culture dissemination of the original works,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the cultural conditioning of paratex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process, goal and mode of paratext's cultural conditioning, so a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role of paratext's cultural conditioning and better serve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Key words: cultural distance; paratext; cultural conditioning; literary translation; cultranslation; translator

1 引言

在文化翻译中,译者常常需要根据读者接受对源语文化进行调节,使其更利于理解和传播。奈达和泰伯认为,文化调节(cultural conditioning)或改动只能在直译可能令读者误解、看不懂或对一般读者而言“信息过载”的情况下才能进行(Nida, Taber 2004: 110)。杨仕章(2004)指出:“在文化传输的过程中,译者总是努力地使原作实

现文化适应,即在保留原作文化的同时,也适当地进行一些调节,以便将原作顺利地移植到译语文化中来”。可见,文化调节通常是指发生在狭义翻译过程之中的译文内文化调节,它与改动、文化适应同义,都是“改变或调整源语文化素(культурема)的形象乃至含义,以使之适存于译语文化”的做法(杨仕章 2014)。

然而,译文内的文化调节首先要以读者阅读

* 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三届导师学术引领计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电子邮箱: huyeshuang@163.com

正文本文为前提。在文化距离的影响下,一些极具文化价值的作品很可能从一开始就被读者冷落一旁、束之高阁,更不要谈正文本文的阅读了。此时,无论译文内的文化调节多成功,译作也难以在异域文化中得以传播和接受。其次,译文内的文化调节囿于正文本文的方寸之地,一方面,很难承载充分理解源语文化所必须的文化语境;另一方面,也难以允许译者显身,与读者直接进行交流。因此,单纯依靠译文内文化调节,极易发生文化信息的失落和误读。

作为正文本文的强化和伴随形式,副文本以其开放性、边缘性和阶段性为弥补译文内文化调节的不足创造条件。副文本的文化调节指相关主体通过副文本书写来拉近译语读者与原作间的文化距离,使读者不断接近源语文化现实的做法。副文本与正文本文内的文化调节相辅相成,共同保证原作域外接受和文化传播的效果。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对副文本的文化调节作用进行研究,从而为推动中国文学作品海外传播提供有益参考。

2 文化翻译视域下的副文本研究

副文本(paratext)概念可追溯到法国文学理论家热奈特(G. Genette)。1979年他在《广义文本之导论》中首次使用这一概念,用来指称“文本和文本之间存在的模仿和转化关系”(Genette 1992: 82)。1997年 *Seuils* 的英译本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问世。在书中热奈特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很少以不加任何装饰的状态呈现,很少不被若干的语言或非语言形式,如作者的姓名、标题、前言和插图所强化和伴随。这些程度和表现各异的伴随形式就构成广为我所称的一个文学作品的副文本”(Genette 1997: 1)。从上述概念可以看出,副文本是正文本文的伴随形式,对其有强化、延伸和显现作用。副文本与翻译研究的关系十分密切,不少学者对此问题都已有充分、深刻的论述(肖丽 2011, 耿强 2016, 刘亚燕 2018)。就文化翻译视域下的副文本研究来说,目前的研究路径大致有两方面:

其一是聚焦某一种副文本类型,如:注释、译序、跋等,对它们的文化作用及其所蕴含的译者文化态度、文化翻译观进行分析。其中,对注释在文化翻译中的作用阐述较多。如:杨振和许钧(2009)指出傅雷为直接阐释作品所做的注,本身就是一种语内“文化翻译”,具有重构文化语境的重要作用。姚望和姚君伟(2013)认为,译注能够在保留异语言、异文化之异的同时,又不让读者受到这些异的

阻隔。而译序、跋等的研究除了关注其文化作用外,更偏重于从具体内容透视译者的文化态度、文化翻译观(郭昱 罗选民 2015)。张季红(2016)通过对译者序的考察,指出林语堂在翻译《浮生六记》时带有中西文化平等的文化态度,并秉承促进中西文化调和融通的文化翻译观。

其二是以副文本概念统摄上述类型,对具体译著中的副文本文化作用进行分析。副文本呈现出的文本间性可消解跨文化“陌生感”,同时有助于洞悉宏观的社会文化。王琴玲和黄勤(2015)指出林太乙《镜花缘》英译本中的副文本能够缩短目的语读者与原语文化的距离,避免文化误读。黄培希(2018)指出威斯《内经》英译本中的副文本有文化建构的作用,具体表现在文化阐释、文化缺省补偿、文化不可译的变通。

上述研究深化我们对副文本文化作用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而,由于副文本的概念域十分宽广,加之在文化翻译研究中受到关注的时间不长,因此现有研究尚存不足,可在以下3方面继续推进:第一,拓展研究深度。副文本类型多样,各类型或具有不同的文化作用,或在相似的文化作用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不宜照搬某一类型(如注释)的文化作用(如补偿文化缺省等)加诸副文本这个整体概念,否则会出现以偏概全和认识重复的问题。同时,目前从具体内容入手透视文化作用的研究比较充分,但对这些文化作用本身的反思和具体实现方式研究不足;第二,提升概括性、抽象性。构建文化语境、补偿文化缺省等作用大多是从副文本内容入手进行分析得出的,而副文本本身具有开放性,内容无边则作用无边,这样一来就很难得出具有概括性、抽象性的认识结果,也就不利于研究的深入进行;第三,避免孤立研究。副文本的文化作用研究是指向翻译接受的,而翻译接受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分为多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接受问题。因此,副文本的文化作用不能孤立研究,不仅要将其与翻译过程相对照,还要放置在整个读者接受过程中来考察。

基于此,本文拟聚焦副文本中由译者书写的语言符号文本(包括序、跋、注释等,下文简称副文本),在整个读者接受的过程中对副文本文化调节的特点、过程、目标和方式进行分析,以期获得新的认识。

3 副文本文化调节的特点

与译文内的文化调节相比,副文本的文化调

节作用具有开放性、边缘性和阶段性特点。探究其特点有助于我们对比副文本与译文内文化调节的异同,并对副文本文化调节在文学外译中的作用进行定位。

3.1 开放性

副文本“与其说是一个界定清楚的范畴,不如说是一个有弹性的空间,它没有外部的边界或准确一致的内核”(Genette 1988)。正是这种广阔的空间性和开放性使副文本成为承载文化差异的理想之所。译者可以在副文本中补充源语文化背景、作品创作经过、作家成长经历、对作品的个人解读、翻译过程和困难等来引导读者理解和接受源语文化。

一般来说,译文内文化调节是针对某一微观文化因素进行的变通,而在副文本中,除了注释具有一定针对性,其他副文本类型的文化调节都不针对微观文化因素的理解,在内容方面表现出多元无边的特点,即没有必须写入的内容,也没有什么内容是不能添加在副文本中的。这一点从副文本的篇幅可见一斑。威斯的《内经》译本以副文本丰富而著称,包括引言、前言、序言等在内,“副文本占了 113 页,如果再算上正文中的脚注和文中注等,这部译作中副文本几乎可以和正文平分秋色”(黄培希 2018)。

除了多元无边,副文本的内容还充分体现译者的主观性。在论证注释的内容要多丰厚才合适时,张佩瑶(2012: 55)曾指出“至于译文究竟要多厚才算是丰厚翻译,必须自己确定。译者必须审时度势,分析各种环境因素,分析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权力关系,以及这种平等或不平等关系如何影响读者的期待视野、接受心理等等”。可见,副文本书写是由译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文化意图来进行的,带有很强的主观性。

内容多元无边和主观性强这两个特点决定副文本的文化调节具有开放性。一方面,副文本的文化调节很少针对具体文化因素的理解,而是面向宏观的文化差异,旨在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受到译者主观性的影响,副文本的文化调节也很难量化和批评。

3.2 边缘性

读者接受是衡量文化翻译效果的重要指标,但文化距离制约着译文读者对原作文化的理解与把握。“要想跨越翻译中的文化距离,以求得译文读者反应和原作读者反应最大程度的近似,正要靠译者对读者的‘选择’‘顺应’与‘关照’。”(屠国元 李静 2007)可见,译者在读者的文化接

受中扮演着重要的引导角色。然而,正文中只能呈现结果,无法展示过程。译者在正文中几乎没有现身的机会,无论他们如何想要拉近读者与源语文化的距离,都不能直接与读者对话。正文处于核心位置,具有高度的封闭性,译者的现身常被视为是不合理、不恰当的做法。(张德福 2017: 19-23)在这种情况下,译者需要在正文外寻求一个能够容纳各方对话的边缘文本。热奈特认为,副文本是“围绕文本的所有边缘的或补充性的内容”(Genette 1988)。从位置上看,副文本是正文本的伴随形式,它围绕在正文本周围,处于边缘位置上,具有开放性。就文化调节作用而言,它不可能代替正文本中的译文内文化调节,只是通过补充边缘内容来构建语境、增加与读者的直接对话,从而拉近读者和原作间的文化距离,降低源语文化的接受和传播难度。缺少副文本的文化调节不会从根本上阻碍译作接受,只是对其接受的效果有一定影响。因此,副文本的文化调节具有边缘性特点,是对译文内文化调节的辅助和补充。

3.3 阶段性

“译文读者的阅读过程也是一个文化接受过程。”(杨仕章 2003: 106)凡是过程都有阶段性。文化接受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相应地,文化调节也应有阶段性,单一的译文内调节首先与文化接受的规律不符,其次也无法满足调节的效果要求。副文本的阅读顺序是由译者安排好的,以最常见的类型为例,即序——注释——跋。从内容上来看,译序一般会介绍译本选材的原由、作者生平和创作经历、原作背景信息、翻译经过和困难、阅读建议、译者观点等几个方面,目的是在阅读译文前使读者亲近源语文化。注释能够帮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跨越微观的文化障碍。而后记,又称跋,多为译者的译后感,以及对读者读后感的进一步启发,总之是回应读者阅读后产生的问题。可以说,副文本的文化调节作用贯穿读者阅读的全过程,分为阅读前、阅读中和阅读后 3 个阶段,使文化接受从译文内拓展到译文外,从阅读中延伸到阅读前和阅读后,从而延长文化接受的过程,间接提升文化接受的效果。

4 副文本文化调节的过程与目标

读者的阅读过程和文化接受过程都是基于时间序列构建的,总体上具有线性特点。相应地,副文本的文化调节也具有一定的时间性。据此,我们将其划分为(正文)阅读前、(正文)阅读中和

(正文) 阅读后 3 个阶段。这 3 个阶段文化调节的目标各不相同。我们以序言、注释和跋这 3 种典型的副文本类型为例进行分析。

序言是阅读前阶段的副文本类型,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指出“一部译著要吸引广大的读者,就必须有详尽的前言,如实展示原著在源语文化中的各方面情况,而不能仅仅让读者了解原著的‘大致’模样”(Bassnett, Lefevere 2001: 11)。序言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读者可能会根据序言阅读的结果决定是否继续阅读译著。作为阅读准备阶段,很多译者在书写序言时都会提及两种文化的共性,以迎合读者的期待视野,尽可能防止文化距离所造成的文化阻塞。如,林语堂在序言中很“擅长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来凸现两种文化的共性……努力促成中西文化的融合”(张季红 2016)。

注释是阅读中的副文本类型。在传统翻译理论中,加注一直被视作一种翻译方法。但是,注释的添加并无可以依据的原文,不属于正文之列。与其他副文本类型不同,注释的文化调节是针对正文中具体文化因素的理解来进行的,且通常与具体翻译方法一起使用,如音译加注等,因而常被认为是一种“补救性”措施,即当读者面对微观文化冲突时起到缓冲作用的文化调节手段。

跋是安排在正文本之后的副文本类型,是文化调节的第三个阶段,即阅读后阶段。经过前两个阶段的调节,读者已越来越接近源语文化现实,但任何调节都是有限的,读者首先是带有本国文化经验的个体,然后才是源语文化的接受者。“接受理论认为,任何读者都不是一张白纸,都有自己的文化先结构,而这种文化先结构也造成他‘误读’异质文化中的文学作品。”(董洪川 2001)所以,在前两次调节没有覆盖到的“盲区”中很可能再次发生文化误读,这种误读可能是对某一个微观文化因素的,也可能是文化价值观上的分歧,甚至是对作品文化价值的歪曲,而这些误读对作品的异域传播十分不利。

跋的主要作用是引导和纠正读者的宏观文化接受效果,引发读者对源语文化的进一步兴趣,为文化再传播创造条件。如,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华克生(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Д. Н.)曾在老舍《猫城记:作品选》俄译本的最后添加一篇名为“Пекин писателя Лао Шэ”(《作家老舍的北京》)的文章。文章中记述译者的北京印象、老舍住所印象、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记、北京的“老舍茶馆”游记,等等,使读者从译本文化空间走向现实文化空间,产

生进一步了解和探索中国文化的兴趣(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2014: 563-574)。

综上,副文本的文化调节作用可基于读者的阅读过程分为阅读前、阅读中和阅读后,每个阶段的分工不同。阅读前是引导读者亲近源语文化、阅读中是缓解微观的文化冲突、阅读后是纠正文化误读、促进文化再传播。相应地,读者与源语文化之间的文化距离在副文本的调节下,总体上呈现不断拉近的趋势。当然上述几种副文本未必同时出现在译本中,因而文化调节的 3 个阶段也未必同时存在,但这不影响我们对其阶段性特点的认识。

5 副文本文化调节的方式

译序、注释、跋的书写主体是译者,译者的文化意图与副文本文化调节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从译者书写副文本的行为可以透视出副文本文化调节的方式。根据上文所述,副文本的文化调节是对宏观文化距离的调节。在汉语中,距离既可以指(两者)在时间上相隔的长度,也可以指空间上的间隔;距离既与视角有关,又与视域有关;距离的调节是由主体完成的,因而与主体密不可分。基于此,副文本的文化调节相应以时间、空间、视角、视域、主体调节来实现。

5.1 时间调节

距离产生于时间。文学作品的时代性与译语读者之间存在时间距离。“一个时代有一个环境,就有那时代环境下的文学。”(茅盾 1979: 143)与此对应,文学接受,包括译作接受,也具有时代性。那些与读者所处时代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译作往往更受欢迎。鲁迅在谈到“G·Byron 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时说“其实,那时 Byron 之所以比较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鲁迅 1933: 44)。

如果说语言上的时间距离(古语使用等)由译内的文化调节去消解,那么由作品的时代性造成的时间距离则要靠副文本来调节。这包括在副文本中介绍作品在本国译介的历史、作品的当代价值、作者成长经历、作品的创作与本国和本国文学的关系,等等。我们以 2016 年俄罗斯 Гиперион 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作品选集《Подли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Акью》(《阿 Q 正传》)为例。在序言中,译者介绍鲁迅作品在苏联时期的译介历史,对鲁迅作品译入俄罗斯的数量、发行量进行介绍,并提到鲁迅是唯一一位被列入《Жизнь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х

людей)(《名人生活录》)和«Библиотека всеми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世界文学丛书》)单独一卷的中国现代作家(Родионов 2016: 5-6)。除此之外,译者还阐述鲁迅作品的当代价值。他指出:“尽管当代俄罗斯读者可能不会认同鲁迅的左倾革命观点,并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政治面貌和文学背景不甚了解……但他的作品直面道德精神的困境,直面国民性的弱点和自由人格的塑造问题,这些问题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现实性,不只对中国读者,对世界读者而言也是发人深思的共性话题”(同上:6)。译者特地提及鲁迅创作与本国文学的关系“在日本期间,鲁迅如饥似渴地阅读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果戈里、屠格涅夫、安德烈耶夫等人的作品”(同上:7)。历史上辉煌的文学成就使俄罗斯人有一种优越感,在看待别国文学的时候难免将其置于俄罗斯文学语境下进行评判,而凸显作品创作或作者成长经历与本国文学的关系迎合了读者的这一心理。

5.2 空间调节

我们对空间的认识,是从点开始,然后逐渐扩大到线和面的。对自己熟悉的地方,我们不仅能够说出地点、街道的名字,还对它们的历史、特点、方位关系甚至文化了如指掌。原作诞生于与译语读者完全相异的空间之中,因此读者对原作空间的感知十分浅显。除了名称外,很难理解到它们所承载的文化意义,而这些文化意义有时对深入理解原作是十分关键的。如,“茶馆”不仅是老舍笔下作品的名字,在现实生活中,茶馆还是老北京重要的社交场所和文化符号。茶馆与俄罗斯读者所熟悉的咖啡馆显然不同,但在对茶馆知之甚少的情况下,译语读者很容易以咖啡馆来类比茶馆,从而产生文化上的误读。相比正文本,副文本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因而可对空间距离进行充分的调节。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华克生在老舍的《猫城记:作品选》译本最后附上一篇名为«Чайная Лао Шэ»(《老舍茶馆》)的文章,文中对北京“老舍茶馆”的位置、室内布置、与老舍作品的关系、所接待的社会名流、服务、文化氛围、茶道等进行详细而饶有趣味的介绍(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2014: 569-572)。这对于读者全面了解真实的茶馆和茶馆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有极大帮助。

5.3 视角调节

视角是叙事学上的重要概念,柏拉图曾提出两种叙述语式,其中一种是“以自己的名义讲话,而不想使我们相信讲话的不是他”(罗钢 1994: 189)。如上文所述,副文本为译者显身提供机

会,使其能够与读者直接对话,对读者的文化接受起到引导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是否能取信于读者十分重要。如若读者对译者在副文本中所书写的内容不够相信,那么副文本的文化调节作用就会宣告失败。因此,译者在书写副文本时,常常会使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形式来调整叙述视角,取信于读者,从而以这种方式拉近读者与原作的文化距离。例如,鲁迅先生在《故乡》中提到一种家乡养鸡的器具——方言说法为狗气杀,并辅以括号在词后进行解释“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在俄语译文中,译者(В. Сухо-руков)将这个词翻译为“собачья досада”(狗气恼),并为这个词添加文外注释“Так у нас называют кормушку для кур...”(在我们国家这个东西叫做鸡饲料槽)。使用第一人称复数使译者公开与译语读者站在同样的“本我”位置上,而将原作和原作中的文化视为“他者”,但这种方式有取信于读者的作用,能够缓解文化距离带来的不适,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源语文化信息。

5.4 视域调节

伽达默尔(2004: 391)认为“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读者的阅读受到个人知识水平、生活经历的制约,因而视域具有个体差异性。同样一部红楼梦,经学家、道家、才子、革命家、流言家所看到的各不相同。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读者接受是群体性的。同一文化背景的读者群体,其接受水平大致相似,这就为译者预测译作的整体接受情况提供了可能,也使副文本的视域调节得以实现。一般来说,译者会在副文本中对原作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进行介绍,其目的就在于调整读者视域,从而引导读者以译者所倡导的方式接受原作。视域调节对译作的接受十分重要,缺乏视域调节的副文本常被认为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如,“1980年,由美国汉学家伯奇翻译的《牡丹亭》全译本出版后,一些英语国家的学者认为译者前言没有提供足够的阅读引导,不足以帮助读者理解原著的伟大之处”(张玲 2014)。

此外,建立中外文学作品间的互文性能够帮助读者在熟悉的视域下接受原作。如,在《镜花缘》的译序中,林太乙将其“与《奥德赛》《格列弗游记》《格林童话》等西方经典相提并论,从侧面肯定翻译文本的价值。这种‘比较式的阅读’无疑会激发目的语读者的好奇心,拉近西方读者和原著的距离”(王琴玲 黄勤 2015)。

5.5 主体调节

广义的翻译过程包括译前准备、语言转换、翻译结果、翻译接受 4 个阶段,涉及的主体有译者、作者和译语读者。但是副文本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以译者为中心,所有与翻译接受有关的主体都可能在译者的安排下出现在副文本中,包括源语读者、两国文学评论家、给译者提出建议的朋友、作者、译语读者,等等。如,鲁迅先生曾为翻译《阿 Q 正传》的俄译者王希礼(Васильев Б. А.)写过一篇译序,经翻译被收录在 1929 年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的《阿 Q 正传》鲁迅短篇小说集中,在 2016 年出版的《阿 Q 正传》鲁迅作品选集译本中也有收录。这是由译者安排的,作者与译语读者的直接对话。这场对话跨越时空,向俄读者传达了作者对作品在异域文化中被解读的殷殷期待,对读者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副文本中主体调节的丰富性使译者书写的副文本内容具有更高的客观性和可信度。以俄罗斯汉学家阿理克(Алексеев В. М.)所翻译的《聊斋志异》选集为例,阿理克的《聊斋》译本在俄罗斯具有很高的认可度和艺术价值。其中,《狐妖集》曾由高尔基亲自校订,但校订的结果令阿理克难以接受。他在题为《中国文学作品及其读者》的讲座中说“聊斋小说并没有被当作文学杰作来读,而仅仅是被看作源于可鄙的迷信而创作出来的奇异故事,作为聊斋的译者,我敢肯定地说,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听到过因有感于我那篇幅较长的序言及其脚注而做出的公正、正确的评论。读者朋友们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聊斋是一部很幼稚的作品’这样一种观念,然而事实上的聊斋绝非如此”(班科夫斯卡娅等 2003)。由此可见,仅由译者书写的副文本可能会遭遇说服力不足的问题,而丰富的主体调节是改变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6 结束语

译语读者与原作间的宏观文化距离对翻译接受有很大影响,关系着译语读者是否会阅读译作、理解译作,以及是否能在阅读后对译作持有公正的印象。因此,研究副文本的文化调节作用对推动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副文本文化调节具有开放性、边缘性和阶段性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副文本能够弥补译文内文化调节的不足,拉近读者与原作间的文化距离,提升翻译接受的效果;将副文本置于读者的阅读过程,也是其文化接受过程来分析有助于理解其文化调节作用的阶段性和不同目标,为译者书写

副文本提供导向;最后我们根据与文化距离相关的五大因素,即时间、空间、视角、视域和主体,对具体的调节方式进行了探讨,为副文本书写提供实践上的参考。

参考文献

- 班科夫斯卡娅 阎国栋 王培美 岳巍. 聊斋的朋友与冤家[J]. 蒲松龄研究, 2003(1). || Bankovskaya, M. A., Yan, G. -D., Wang, P. -M., Yue, W. Friends and Opponents of Liao Zhai Zhi Yi [J]. *Study on Pu Songling*, 2003(1).
- 董洪川. 接受理论与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研究[J]. 山东外语教学, 2001(2). || Dong, H. -C. Reception Theory and Study of “Cultural Misreading”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J].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2001(2).
- 耿强. 翻译中的副文本及研究: 理论、方法、议题与批评[J]. 外国语, 2016(5). || Geng, Q. Paratext in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Perspectives, Methods, Issues and Criticism [J].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2016(5).
- 郭昱 罗选民. 学术性翻译的典范[J]. 外语学刊, 2015(1). || Guo, Y., Luo, X. -M. A Fire Example of Scholarly Translation [J].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2015(1).
- 黄培希. 副文本与翻译文化建构——以艾尔萨·威斯《黄帝内经·素问》英译为例[J]. 上海翻译, 2018(3). || Huang, P. -X. Paratexts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ranslation — A Case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Huangdi Neijing Suwen* by Ilza Veith [J].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2018(3).
-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 Gadamer, H. -G. *Truth and Metho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Volume 1* [M].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4.
- 鲁迅. 鲁迅杂感选集[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33. || Lu, X. *Lu Xun's Anthology of Random Thoughts* [M].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33.
- 罗钢. 叙事学导论[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 Luo, G. *An Introduction to Narratology* [M]. Kunming: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4.
- 茅盾. 文学与人生[A]. 茅盾研究资料集[C]. 济南: 山东大学中文系文史哲研究所, 1979. || Mao, D. Literature and Life [A]. *A Compilation of Research Materials on Mao Dun* [C]. Jina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History

- and Philosophy of Shandong University, 1979.
- 屠国元 李静. 文化距离与读者接受: 翻译学视角[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7(2). || Tu, G.-Y., Li, J. Cultural Distance vs Reader's Reception: A Translational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2007(2).
- 王琴玲 黄勤. 从副文本解读林太乙《镜花缘》英译本[J]. 中国翻译, 2015(2). || Wang, Q.-L., Huang, Q. An Interpretation of Lin Taiyi's Translation of *Jing Hua Yu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atext [J].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2015(2).
- 王雪明 杨子. 典籍英译中深度翻译的类型与功能——以《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为例[J]. 中国翻译, 2012(3). || Wang, X.-M., Yang, Z. Types and Functions of Thick Translation in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 A Case Study of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ume 1* [J].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2012(3).
- 肖丽. 副文本之于翻译研究的意义[J]. 上海翻译, 2011(4). || Xiao, L. The Significance of Paratext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J].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2011(4).
- 杨仕章. 文化翻译论略[M].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3. || Yang, S.-Z. *On Cultural Translation* [M]. Beijing: Yi Wen Publishing Military, 2003.
- 杨仕章. 翻译与翻译中的文化干扰[J]. 中国俄语教学, 2004(1). || Yang, S.-Z. Cultural Interference in Translation [J]. *Russian in China*, 2004(1).
- 杨仕章. 翻译中的文化适应研究[J]. 中国俄语教学, 2014(3). || Yang, S.-Z. On Cultural Adaptation in Translation [J]. *Russian in China*, 2014(3).
- 杨振 许钧. 从傅雷译作中的注释看译者直接阐释的必要性——以《傅雷译文集》第三卷为例[J]. 外语教学, 2009(3). || Yang, Z., Xu, J. On Necessity of Translator's Direct Explanation — A Study of a Collection of Fu Lei's Translations [J].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9(3).
- 姚望 姚君伟. 译注何为——论译注的多元功能[J]. 外语研究, 2013(3). || Yao, W., Yao, J.-W. What Is the Function of Annotations? — the Plural Functions of Annotations [J].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2013(3).
- 张德福. 森舸澜《论语》英译本的“丰厚翻译”[J]. 外语学刊, 2017(5). || Zhang, D.-F. The Thick Translation in *Confucius Analects* by Edward G. Slingerland [J].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2017(5).
- 张季红. 浅析林语堂的文化态度与跨文化传播实践——以林译《浮生六记》的翻译为例[J]. 上海翻译, 2016(1). || Zhang, J.-H.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Ling Yutang's Cultural Attitudes and Hi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 — With *Fu Sheng Liu Ji* as a Case Study [J].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2016(1).
- 张玲. 汤显祖戏剧英译的副文本研究——以汪译《牡丹亭》为例[J]. 中国外语, 2014(3). || Zhang, L. The Paratextual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ang Xianzu's Dramas — A Cas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Peony Pavilion* by Wang Rongpei [J].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2014(3).
- 张佩瑶. 传统与现代之间: 中国译学研究新途径[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 || Zhang, P.-Y. *Mediating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New Approaches for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M]. Changsha: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 Bassnett, S., Lefevere, A.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Genette, G. The Proustian Paratexte [J]. *SubStance*, 1988(2).
- Genette, G. *The Architext: An Introduction* [M].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Genette, G.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Nida, E. A., Taber, C. 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Д. Н. Пекин писателя Лао Шэ [A]. Лао Шэ. *Записки о Кошачьем городе: избранное* [M]. Перево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Д. Н. М.: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14.
- Лу Синь. *Подли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Акью* [M]. Перевод Родионова А. А. СПб.: Гиперион, 2016.